

資政史鑑

修身卷

編委會主任

叶选平

總主編

邢賁思 戴逸

葉選平題



人民出版社

资政史鉴

【修身卷】

第一册

编委会主任 叶选平

总主编 邢贵思 戴逸

副总主编 周溯源 和宏明

本卷主编 杜若明 史礼心 张忠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编辑:孙兴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政史鉴/邢贲思,戴逸总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ISBN 7-01-003344-7

I. 资…

I. ①邢… ②戴…

II. 国家-行政管理-经验-中国-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961 号

资政史鉴

ZIZHENG SHIJIAN

邢贲思 戴 逸 总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02.625

字数:160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套

ISBN 7-01-003344-7/K·666

定价:2860.00 元(全四十五册)

修订版出版说明

《资政史鉴》一书,由我社于 1998 年 12 月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在社会各界及广大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承蒙广大读者厚爱,该书第一版已售完,我社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组织资深编辑,历时一年多时间对该书进行了修订,现修订版为大 32 开,共 45 本。在修订版付梓之际,再次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殷切希望大家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使该书精益求精,为帮助各级干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和领导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人民出版社《资政史鉴》编审组

本版《资政史鉴》是在 1998 年 12 月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重印。参加修订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排列):

尤开元(组长)	王开基
尹选波	乔雨舟
孙兴民	孙祥秀
张作耀	张昭军
张维训	戴联斌

《资政史鉴》编委会

主 任

叶选平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守和 白 钢 刘国光 苏 星 苏双碧

李学勤 吴建国 启 功 张岂之 张岱年

李维林 金冲及 赵宝煦 袁宝华 廖盖隆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幼军 王梦奎 王 晨 尤开元 许中田

汝 信 关壮民 孙楚寅 李传华 李权时

李源潮 张丁华 张作耀 张明达 陈至立

林炎志 杨崇汇 尚 文 房凤友 赵可铭

侯树栋 贾天增 郭超人 顾秀莲 梁金泉

黄远志 韩立成 楚 庄 臧恩钰 戴 舟

凡 例

一、本书是一部大型的领导类工具书，其宗旨是为社会各界领导干部提供中国历史上可资学习、借鉴和参考的为官的成功经验、典型事例和教训。

二、本书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中国从上古直至近代各历史时期多方面关于为官从政的史料，并按其具体内涵编写成十卷：为政、谋略、理财、用人、革新、修身、处世、治事、清廉、教训。

三、每卷结构为：序、前言、卷首语、导读、篇、节。序、前言为各卷共有。各卷卷首语用以提纲挈领地介绍该卷内容和论述主要思想观点；每卷分为比例大体相等的二十篇左右，每篇的开头有五千字左右的导读，对本篇内容作简单的评议；每篇分若干节（有的卷不设节），每节下含若干自然篇。

四、内容编排不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内容事理逻辑为序，篇、节、自然篇（都拟有标题）三个层次，层层相扣，围绕该卷主旨展开。

五、自然篇中的“白话文”部分是在忠实于后附“主要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并对人物、情节、背景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补充，以求“信”、“达”，便于阅读理解。

六、“主要参考文献”所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版本。

七、本书数字用法：朝代历史纪年、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前722年）、明嘉靖三年（1524年）等；文献出处的卷次也一律括注阿拉伯数字；其他文中数字一律用汉体写法。

八、“主要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先秦以前的史料只标注书名、篇章，如（先秦）《荀子·不苟》、《论语·子张第十九》等；先秦以后的史料则标注朝代、作者、书名、卷次或××列传，如（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8）等。

九、本书文字除个别历史人名如魏徵等遵循历史习惯写法外，全部采用标准汉字简体写法。

序

李瑞环

中国古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饱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的一笔丰厚遗产。如何使人类这一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为振兴中华服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

1987年秋，我在《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序言中曾寄语有志于此的专家和学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浩瀚的古文献进行整理选编，按不同专题辑录成书。我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同志们的响应，很快编成《从政史鉴》，出版问世。我国几千年来诸多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乃至“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布衣之士，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论述，政事活动的经验、体会，荟萃一书，既博且精。这本历史教科书，对于一切乐于和善于学习的政治活动家、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群众社会工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要重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几次动员、组织若干专家学者投身于此项工作。我所以如此热心于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对历史有什么癖好和偏爱，更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我始终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历史具有承继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就决定了: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再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这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和殉国家之急的爱国的崇高情操,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可以说,现实的中国是无数代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因此,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认识现实的中国,而且需要认识历史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就会在不断重温伟大祖国的光荣史和悲惨史、斗争史和苦难史中,吸取热爱祖国的巨大力量,激发自己作一个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真正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还历来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共同成果,这就决定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不但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的,而是经过不同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创造的成果;它也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服务。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明遗产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历代王朝交相更替,阶级关系不断变化,但人们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接受、利用和借鉴的。且不说中国兵、农、医、艺的实用文化,诗骚曲赋的文学精粹,民谚俚俗的熠熠智慧,即使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我们的先辈所提出的许多至理名言,都使后人受益无穷。诸如“正奇互补”、“乱极而治”的朴素辩证法,“民为贵”、“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魂系中华、“爱国如饥渴”的民族凝聚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其中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那种把所有的历史文明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是“左”的庸俗社会学。

要继承、借鉴好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就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廓清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的总结,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鉴往而知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对古文化遗产抱残守缺、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而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甚至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把我国悠久的历史斥之为历

史“积淀”，视为沉重的“负担”，更是极其有害的。时至今日，许多东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化。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与发掘，倒显得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不是深了而是很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从政史鉴》的编辑成书，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有益的探索。我为《中国历史文献精粹大典》的出版曾讲了上述一些看法。这里不烦重复，再次强调，目的在于引起更多同志的重视，期望一切锐志于改革进取的学者专家们投身于这项挖掘古文化遗产的开拓工作。是为序。

〔注：本文原为《从政史鉴》一书的序言，李瑞环同志同意用作本书之序。〕

前 言

汲取历史智慧 提高领导水平

邢贲思 戴 逸 周溯源

一、《资政史鉴》的由来

公元 1084 年,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诞生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言。《资治通鉴》一经问世,便对中国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官吏子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人们评价它的作用:“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已影响了中国历史近千年,无疑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公元 1998 年,一部与《资治通鉴》名字相近的总结概括历史经验的历史著作《资政史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10 卷,分:为政卷、理财卷、谋略卷、用人卷、革新卷、修身卷、处世卷、治事卷、清廉卷和教训卷,每卷 160 万字左右,全书总计 1600 余万字,由数百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历经六载,集体编撰而成。编撰者们均系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从事史学、政治学、领导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或教学人员,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求是杂志、九三学社等单位。

为什么要编撰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呢?一句话:总结历史遗产,

丰富领导科学,增强干部素质,提高领导水平。

领导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兴起。每年陆续有新的论文、论著发表、出版。这些论文、论著,有介绍国外的,有研究中国的。十多年来,这方面的书已出了数十部,论文则成百上千。有的书已为读者熟悉,诸如《治策通鉴》、《从政方略》、《古镜百鉴》、《国史镜鉴》等等,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推陈出新,各有千秋。这些论文、著作的发表、出版,无疑丰富、繁荣了我国的领导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广大干部的需要和渴求。但它们大多篇幅不长,几十万字,百多万字,至长者也不过几百万字。取材也是侧重于某个或几个方面,尚未涵盖领导科学的所有主要方面。特别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科学的发掘整理,还很不充分,还有很大的余地,有许多工作可做。那么,可不可以出一部大而全的书呢?它从二十六史,从经史子集以及有关的书中,广泛选取与为政有关的史料,编译成白话,分门别类,供领导干部学习、借鉴,以满足广大干部不断增长的需要呢?本书的主编、顾问、编委和作者们就是这样考虑和追求的。历经六个寒暑的辛勤劳动,通力合作,并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热诚帮助下,终于使这部大书得以问世。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经验

我们之所以编著《资政史鉴》,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学部分,有不少精华,有批判继承的价值。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政治活动以后,就开始逐步积累从政经验,有人就开始研究政治艺术,探讨领导科学。领导活动虽然是主观活动,但它又有客观的一面,为政有道,治国有方,安邦有法。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黄河一样源远流长,从遥远的上古奔腾而来,滔滔汨汨,不止不息。黄河的中华文明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恒河的古印度文明,并称世界四大古文明。但是,古埃及、

巴比伦、古印度文明早已中断，惟独中华文明如养育它的黄河一样，奔流不断，一往无前。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灿烂的文化，其中无疑包含了我们的祖先在政坛上积累的大量经验、领导艺术，这些从政经验和领导艺术中的优秀成分，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精华。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有许多杰出的帝王将相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群山中，耸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奔涌出一泓又一泓的思想清泉；在专制和愚昧造成的漫漫黑夜里，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的智慧明灯。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为了“修、齐、治、平”，程度不同地作过可歌可泣的拼搏。他们面对迷离混沌的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间社会，变幻频仍的人生祸福，周而复始的战乱和平，在那里呕心沥血，上下求索，探寻着那数不清的“为什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与命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派与体系，企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他们批判“苛政猛于虎”的剥削制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呼声，发现了“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人不相预”、“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客观规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积极主张，揭示了名实关系、分合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动静关系的辩证法，高扬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旗帜，到近代则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认识，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放射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光芒。中国在几百年以前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曾经在许多领域登上过当时的科学的高峰，与他们的这些理性认识和成功实践无疑是分不开的。

领导活动是艺术，也是科学。不能设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而且多次出现盛世的局面，如果没有一些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历史规律的政策和策略，没有一批明君、贤相、志士仁人对国家的尽心治理，励精图治，而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历史

文明。所以,对我国古代的领导科学,应该肯定有精华部分,对这些精华部分应加以总结,并且批判继承。

首先,古代思想家认识到领导活动是一门科学,必须遵其“道”方能成功。早在战国时代,荀况就已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君主拥有最高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道也”。也就是说,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有道才能兴邦,无道必然亡国。南宋学者叶适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单凭权势治国的道理。他说:权势只能强迫人服从于一时,道义才能令人心服。所以,“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以符合道义的方式运用权势,才能长治久安。

其次,关于民本主义,这是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会学说之一,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这种学说认为,民众是国家或社会的根本和决定力量,统治者要重视民众的作用和利益,尊重民众的意志和人格。民本思想,主张“重民”、“利民”、“富民”、“爱民”、“恤民”。民本主义在我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思想渊源甚早,远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季梁、史墨等人明确指出,决定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是人不是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不重视人而重视神,国家必然灭亡。这在当时天命论占统治地位并主宰人的思想的时代,无疑是一次思想突破。老子和孔子也都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民的重要作用也多有论述。

重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民本思想的提出。在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孟轲。他大胆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甚至说,君王无道,民可以弑君。

战国末期的荀子,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他用水比民、舟比君的比喻来说明民众的作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真正有力量的是民众。他提醒国君要充分认识这一问题,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他还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只有民富了才有国家的富强。后来的韩非、吕不韦对这一思想有进一步的发挥。

到了汉代,民本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汉初著名思想家贾谊,为了

巩固汉朝的统治,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写了一部包括《过秦论》在内的《新书》。在《新书》中,民本思想得到了新的阐扬。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宋明以后,民本思想继续发展,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程颢、程颐认为:“民惟邦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文集》卷5)。这类民本思想,宋代的司马光、朱熹,明代的张居正莫不认同,都有论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都对民本思想有所发展。到近代之后,又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进一步发展成近代的民主思想。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将它引向了“民为邦本,吏为公仆”的理想大同世界。

第三,关于治民之术,古代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专制制度下,君主权力高于一切,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惩罚。四千年间,皇冠落地,王朝倾覆,屡见不鲜。于是,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不可等闲视之,治民之术大有讲究。例如大思想家荀子,他用三种形象化的比喻说明君民关系:一比人民像拉车的马,统治者是坐在车上的人,马安静地走,车子平稳前进;马惊恐暴怒,车子和人都会粉身碎骨。二比人民是江河湖泊的水,统治者是水上的船,风平浪静,船安稳地在水上航行;狂风巨浪,船会埋葬于惊涛骇浪之中。三比人民是鸟,统治者是树,鸟选择树,树不能选择鸟,树好鸟来,树坏鸟去。

先秦各家的治国方略,都涉及采取何种措施以保持政权的稳定。如孔、墨主张爱民、利民,孟子要统治者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设身处地地替人民群众考虑,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吕氏春秋·顺民》中认为“顺民心,功名成”,刘向《说苑·政理》中指出“治理之道,爱民而已”,《贞观政要·君道》中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等等,都是颇有见地的。

第四,关于用人之方,古代也有很多精彩的言论和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历代君主是通过官吏去治理人民的,这样,就产生一个用人问题。我国古代,人治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有乱君,无

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是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君主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唐太宗说：“至安之本，惟在得人”；清雍正皇帝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由于重人治，所以对用人之道也就特别讲究，作了许多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代用人之方无非是如何发现、识别、使用、培养人才。人才的标准不外乎“德才兼备”，“德”是对统治阶级忠诚，“才”是具有管理国家的才能。

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诸葛亮等，都对用人的问题作过探讨，留下了精彩的论述。

第五，关于中华民族精神问题。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上古文献《周易》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自强不息”，一句是“厚德载物”。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天体、日月、星辰，昼夜运行，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来，明天太阳也一定从东方出来，太阳不会懒惰，永恒运动，许多行星也是这样，那么，人就应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自强不息观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载物”，大地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什么东西在地面上都可生长，那么，人就应胸怀广大，无所不容。这些思想观点，反映在民族关系上格外明显。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坚强不屈的，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反对扩张主义，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点一直指导、鼓舞着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可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

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许多的优秀成分，在此前言中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作用，得到了西方有识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同。就以孔子的国家管理学说为例，当其传入欧洲以后，曾经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之一。在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狄德罗为代表）把孔子的治国理论、管理思想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来接受。